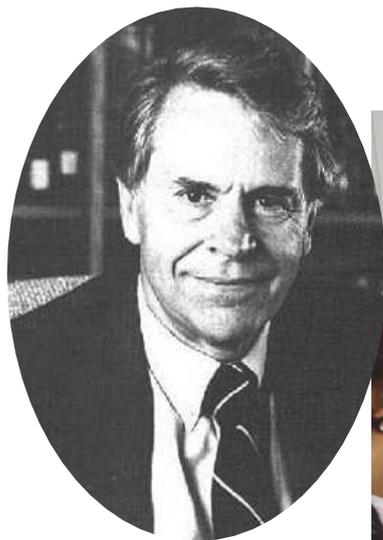


克里斯托弗·拉希与他的平民主义理想

贾敏

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,拉希遇到他人生中几位重要的学术和思想导师,其中有理查德·霍夫施塔特、威廉·里希滕伯格,而他真正的授业导师,是日后成为他岳父的著名历史学者,20世纪美国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亨利·斯蒂尔·康马杰。他与拉希看似亲密而实则紧张的关系,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前者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。

如果把历史学家、社会批评家克里斯托弗·拉希(Christopher Lasch, 1932—1994)视作20世纪美国思想文化浪潮中的失踪者,自然是有失偏颇的。远的不说,2019年恰逢拉希的经典著作《自恋的文化:失望年代的美国生活》(*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,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*)出版四十周年之际,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政论作家小尤金·迪昂(E.J.Dionne Jr.)为诺顿新版撰写一篇饱含深情与敬意的序言,称许拉希对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刻诊断具有恒久的影响力,“自恋心态”已然成为剖析美国消费文化最为贴切的词汇,自由派应听从拉希的谏言,更多从自身找寻病因而非让民众替罪。迪昂的序言还透露,史蒂夫·班农(Steve Bannon)曾不无得意地指出,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拉希诊断最好的预言。由此观之,克里斯托弗·拉希这个思想幽灵依然飘荡在美国文化战争的漩涡之中,未曾离场。



拉希(中)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中

然而,假使我们对拉希的思想谱系有深入而全面的理解,那么投身思想产业市场,成为万众瞩目的知识分子偶像绝非他之所愿。拉希本人更愿意保持做一位与主流思潮疏离,始终批判进步、呼吁拥抱希望,期盼重回美国过往,找寻被遮蔽的平民主义传统

(Populism & Populist Vision)的谏言知识分子。拉希曾痛斥美国自由左派的观念自恋与党派倾向,质疑身份政治与多元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,捍卫传统家庭、婚姻、乃至女性身份的道德意义,反对以进步之名删减、扭曲、抛弃传统。如此这般的反激进立场自然惹恼了

众多学院左派,沉默与无视拉希的观点成为众多学术主奏不约而同的选择。保守右翼则对拉希重视家庭与道德秩序,提倡重回传统的立场赞赏不已,试图追封其为文化保守主义者,进而拉入自家的政治阵营。但是拉希身前就明确表示,他所寄予厚望的世界,并

非里根式的道德乐观主义,而是由19世纪的平民党人所维系,这与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立场可谓南辕北辙。

无论是美国学界,还是中国的美国研究领域,对于拉希的著作和思想谱系的研究都是

(下转5版) ➔

◀ (上接3版)

续之著作作为“后继”。

温公修《通鉴》前,已有《通志》八卷奏进。修《通鉴》期间,同时完成而为世所习知者,有《通鉴考异》《通鉴目录》二书。张氏网罗文献,知存者有《稽古录》二十卷、《涑水纪闻》十六卷,虽逸原编而存于《稽古录》者则有《历年图》及《百官公卿图》二书,以及《通鉴释例》,虽编在温公曾孙伋,然多存温公著书时旧说,为存者七种。亡者则有《通鉴举要历》八十卷及《通鉴节文》六十卷,亦援据文献明其内容及遗失原委。

后继部分之论列,用力尤深,细分为踵纂、注释、订补、论断四目。如踵纂,又包含协助温公著书者刘恕先于《通鉴》完成之二书,宋人胡安国、龚颐正、蔡幼学接续温公相关书之著作,李焘、李心传、刘时举据《通鉴》体例述本朝史诸书,金履祥补《通鉴》前史之著,以及明清

诸家循例撰宋以后各代编年之著。至袁枢改编《通鉴》,以事为中心作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朱熹责温公不讲正统、不明褒贬,删节其书为《通鉴纲目》,二书又各有所枝衍。注释一派,宋有多家,仅存史炤《释文》,张氏斥为“浅陋粗疏”,而独重胡注,此自是明清以来通论,张氏于胡注得失各有叙述,态度也较客观。订补一派,张氏特别推重的,一为刘恕子羲仲著《通鉴问疑》,赞其能读父书,虽未及见温公,而与参修学士范祖禹讨论独多,范之解答,也颇得其要。二为严衍《资治通鉴补》二百九十四卷,赞为“胡身之后仅见也”。论断一派,指借《通鉴》以讨论兴亡、褒贬人物者,代有其书,张氏对此仅述李焘、张溥、王夫之数家,点到为止,因此派与温公学术关系最远,不必深究。

第七章《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》。张氏谓其论《通鉴》之得有三,“合《纪》《传》

《表》《志》为一编,合独断考索为一编,合史学文学为一编”。失亦有三,“系年方式之过整,文化史料之太略,作者感情之或偏”。书末更提出改造编年史之建议十九则,可见其研究旧史学、建设新史学之用意。

以上略述《通鉴学》之全书宗旨与各章大义。张氏自云以四、五两章最为重要,我于三、六两章亦深致意焉,故分述如上。

《通鉴学》的学术地位

张煦侯先生成长与为学的时代,旧学未断,新学竞萌,新旧交战,也互为参取,各成气象。张氏幼习经子,学出塾师,虽进新学堂,仍眷情文史,自拓疆域。著述皆存旧学根基,参新学因子,足成一家言。《通鉴学》之内容既如前述,其成就前人讲之已多,局限亦显而易见。

《通鉴学》初版出版至今已七十三年,张煦侯逝世已逾五十年。1957年此书再版时,作者曾稍有删改,并撰《再版自序》,表达他对时代改变后认识的相对变化。但也可从中读出,所作删改所涉极其细微。

七十多年间,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出版研究司马光与《资治通鉴》的著作,我所见即有几十种之多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校本《资治通鉴》的出版,张氏应该见过,但没有留下意见。二是日本发现别本司马光文集,保存大量司马光经筵讲史的记录。三是就司马光生平、《通鉴》之成书过程、三位助手及其史学的研究,以及后世帝王、宰相、学人阅读评点《通鉴》著作之出版,乃至《通鉴》与宋元讲史话本之关联,都有很好的论列。香港黎启文曾编《通鉴胡注引佚书考》(自印本,将《考异》视同胡注),将《通鉴》引书作了逐条梳理。《通鉴》史学思想与成就之研究,成绩更多,新

见迭出。七十年前的《通鉴学》,确实有些过时了。

然而若放在历史过程中来看,则该书是奠定《通鉴》学的开辟著作,《通鉴》一书的大端问题,该书都提出来了。同时,该书存旧经史学之精神,有新学术的理念,对编年体源流之梳理,对《通鉴》创新与史法的揭示,对司马光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纂著《通鉴》,存史事,析名分,重纲纪,弃褒贬而明史法,叙人事而忽天变,倡一统而轻正闰,究真相而详考证,都有绵密之分疏与论列。其立场既不同于宋元理学之迂执,又不似今日学者那般以后世概念套古人作为,能在传统礼法与道德的立场上,在传统史书与文学书写的技法上,揭示《通鉴》的特见与司马光的学术勇气。就此数端言,此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)